

doi:10.3969/j.issn.1674-117X.2024.06.012

文化诗学视域下双雪涛小说结构探究

伍丹, 吴晗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 从文化诗学的独特视域深入剖析双雪涛小说的结构及其深层意义。双雪涛“东北之子”与“失落东北的逃离者”并举的文化身份使其叙事脱离了现实主义传统, 形成了复杂的、分裂的文本迷宫; 现代主义非线性叙事与现实主义线性叙事、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父辈规范与子辈个人主义构成了复杂而深刻的文学景观。这些元素不仅相互对抗, 更在深层次上交织融合, 其暗含着东北“子一代”对东北失落之谜的理性探讨与追问; 在作者所创造的开放性寓言中, 文本结构焕发着询唤现实的意义, 读者与小说主人公、小说作者, 共同在个人感受、经验以及“寓言”文本的交融中获得了某种对抗现实的力量。

关键词: 双雪涛; 小说结构; 文化诗学; 非线性叙事; 开放性寓言

中图分类号: I207.4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24)06-0092-08

Exploring the Structure of Shuang Xuetao's Novel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etics

WU Dan, WU H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uniqu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poetic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structure and profound meaning of Shuang Xueshao's novels. Shuang Xueshao's cultural identity as "a son of Northeast China" and "an escapee lost in Northeast China" has led his narrative to deviate from the traditional realism, forming a complex and fragmented text labyrinth. The modernist nonlinear narrative and realist linear narrative, collective discourse and individual discourse, as well as the paternal norms and the individualism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have formed a complex and profound literary landscape. These elements not only oppose each other, but also intertwine and merge at a deeper level. It implies a rational exploration and questioning of the mystery of the loss of Northeast by the "offspring gener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author's open allegory, the text structure glows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inquiring into reality, and the readers, together with the novel's protagonist and the author, gain a certain power to resist reality through the fusion of personal feelings, experiences, and the "allegory" text.

Keywords: Shuang Xuetao; novel structure; cultural poetics; nonlinear narrative; open allegory

收稿日期: 2024-06-20

作者简介: 伍丹, 女, 湖南湘潭人, 湖南师范大学讲师, 博士,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当代文学。

青年作家双雪涛携带着东北故事闯入文坛, 凭借着独特的叙事风格以及深厚的写作功底被评论界誉为“迟来的大师”。孟繁华将双雪涛列入“80后”作家考察队列中, 断言其小说创作将会有广阔的前景; 黄平将双雪涛、班宇、郑执命名为“新东北作家群”, 力图赋予其“文学史”上的意义。显然, 双雪涛的创作引发了大众文化领域以及纯文学领域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由于“新东北作家群”与文学史中“东北作家群”命名上的相似性, 学界往往视前者为后者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继承人, 双雪涛的作品也因此常常被置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中进行考察, 被贴上“现实性”“地域性”“真实性”等现实主义标签。其实, 双雪涛的小说结构明显背离了现实主义的书写传统, 其不但没有以纵向书写的现时描述以及人物先行的层递关系进行现实主义式的表达, 还将现时叙事搁置于种种分岔路口, 以时空的合并、叙事聚焦的转变以及记忆的虚实衍化, 将线性叙事分割得支离破碎。不过, 其所构筑的非线性叙事并未走入“先锋作家”与“超文本”的叙事怪圈, 小说中仍存在着现实主义因子。以文化诗学为研究视域, 分析双雪涛小说文本结构与历史语境的关系, 能更好地解释双雪涛小说结构的形成原因, 并明确其与现实互动、创造出别样美学空间的过程。

本文运用的文化诗学, 不局限于美国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 而主要是以童庆炳、李春青为代表的, 涵括语言与文化相互拓展、内部与外部视角贯通, 并达成人文与审美相互对话, 且立足于中国当代语境的中国本土文化诗学。本研究聚焦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历史语境与文本结构间的动态交互, 试图对双雪涛作品的结构艺术展开跨学科探索, 揭示双雪涛艺术文本的审美特质与诗意内涵, 力求突破学术界对双雪涛“现实主义书写”的单一评价维度, 进而探索现实主义文学评价标准的新路径, 在现实层面上寻找到双雪涛小说对社会以及人生价值的别样启迪意义。

一、身份扭结: 两种声音的共存

在文化诗学的研究视角下, 双雪涛的文化身份不仅仅体现在小说的“历史背景”或“创作环境”中, 它更深层次地渗透进小说文本中, 产生了显

著且深入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外在的, 更内在地构成了小说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如同巴赫金在描述文化语境时所指出的, “当下的社会情境和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完全——并且可以说是从内部——决定了言语的结构”^[1]。由于双雪涛“东北之子”与“失落东北的逃离者”并举的文化身份, 其小说中存在着两个维度: 一个是取消了线性叙事的开放性结构; 一个是充满现实主义因子的东北故事。这使得双雪涛小说的文本结构复杂多变, 两种声音在结构中共存。

谈及创作的最初动因, 双雪涛屡次相告, 他踏上文学征途的驱动力, 并非源自剖析历史深邃层面的动力, 而是源自内心深处对文字编织乐趣的向往。然而, 在创作的征途中, 他却不得不直面那片熟悉而又复杂的历史沃土, 以至于描绘东北成了他“一条无法挣脱、命中注定的轨迹”^[2]。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 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赋予东北粗糙的、生猛的地域性格。国家在“一五”“二五”期间将相当部分的财力倾注于沈阳铁西区。根据有关统计数据, “截至1952年, 铁西区已有企业560家, 其中有82家大型国企”, 东北自然成了昔日的“共和国长子”^[3]。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时, 生活在东北城市的大多数人却被命运横切了一刀: 工厂改制, 经济败落, 民生失衡, 工业衰落。社会秩序的变动, 击碎了双雪涛父辈们安居乐业的美梦, 他们不得不面对被时代抛弃的命运, 成为市场经济改革的失语者。东北这片曾经辉煌的工业热土, 在时代的洪流中来到了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转折点, 并成了双雪涛小说叙事不可或缺的历史起点。

文化身份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 它涵盖了身份的文化属性以及文化实践两个核心层面。前者指身份的形成受到某种文化特性的限定, 后者指身份受到主体所参与的文化实践影响。文化身份在文化属性、文化实践和主体行为这三者的互动过程中不断生成、重构^[4]。双雪涛及一众新东北作家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沈阳, 这个处于世纪之交的时空体蕴含着多重的过渡节点。昔日东北集体主义的身份意识、思想以及价值观念不可避免地融入双雪涛的心理图式以及认知结构。在双雪涛的文化身份塑造过程中, 主体受到集体主义这一社会特性的制约与影响。在文化身

份形成之际,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扮演了限定性的角色,从而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与此同时,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席卷着这片辽阔的平原。面对漂浮于社会的焦虑情绪,作为“经验者”的子代、目击者的一员,双雪涛在某种程度上,期盼着逃离边缘化的东北,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寻求到自身的立足之地。可见,东北集体主义带来的深厚文化属性与他面对东北失落后毅然选择的“逃离”之路,两者交织碰撞,共同锻造了双雪涛复杂而扭结的文化身份。

故,从双雪涛扭结的文化身份角度观察其叙事结构,或许能够解锁双雪涛“先锋性”的别样意义。其代表作《平原上的摩西》,本是一个时间线清晰的故事,但双雪涛不满足于单纯的“东北场景+悬疑故事”的平铺直叙,有意突破线性叙事的现实主义叙事方式。他在《平原上的摩西》中划分不同的篇章,分别以七个叙事人讲述故事。第一章中,庄德增讲述了庄树与李斐相识的经历;第二章以蒋不凡为叙述者,小说情节猛然跳向了某场凶杀案;第三章出现的李斐,使故事跳脱了来自于凶杀案的紧张氛围,其向读者叙述了其童年经历。在小说后几章节傅东心与李斐的交错叙事中,小说的悬疑色彩似乎淡化,叙述重心落在了东北下岗潮的讲述中。迷失的读者似乎在庄树的叙述中寻觅到了某种真相,但又被孙天博、傅东心的故事搅乱。第一章节的叙述人庄德增,不再以庄树的父亲形象出现,而成了杀害傅东心父亲同事的凶手。最终,真相似乎要水落石出,但故事却在叙述到湖中央的情景时戛然而止。就这样,跨越40年的故事线索相互交织。一面是充满悬疑色彩的凶杀案,一面是工厂私有化后的下岗风潮,还有一面是李斐与庄树带有抒情色彩的爱情故事。相较于固化的、稳定的叙事结构,多重第一人称视点形成了跳跃式的镜头“散焦”,各类人物的故事线依次展开,固有的时间秩序被打乱,作者在盘根交错的结构中,完成了多元时空下的叙事合并。

双雪涛的其他小说,在结构上也大多摒弃了传统文本的直线式、顺序发展的线性模式,采用了非线性结构。在《北方化为乌有》中,创作者以对话形式结构全篇。刘泳以第一人称描述了一场

凶杀案,却意外发现“米粒”写了一篇具有相同故事内核的小说。如同《十日谈》的叙述结构,“米粒”的回忆性叙事与刘泳、饶玲玲的现时性叙事在小说中共存。在《跷跷板》中,一个文本记录着“我叔”对于过去的回忆,另一个文本又讲述着“我”在现实中的怪异经历。《光明堂》的叙事结构更加复杂,作者本是以“我”(李默)的视角展开叙事,文本却因“林牧师之死”讲述了“我”与“柳丁”的成长故事,并将二姑等一众下岗工人的故事纳入其中。读者通过叙事结构的分支,不断游走于相互交叠的文本迷宫中。

20世纪30年代,东北作家群集体亮相,他们高举着五四时期流传的现实主义大旗,其作品不管是书写历史视野下的奉系军阀割据、局部抗战的开始,还是新中国后的工业建设,都强调集体主义的凝聚力。如今,东北的集体历史屈服于凸显个体的市场体制,双雪涛们也以亲历者的身份历经了时代的更迭。双雪涛许多小说都存在“逃离”情节,而在现实中,包括双雪涛在内的新东北作家也都迁出了东北,来到了“北上广深”般的现代大都市,成了身心双重意义上的“逃离者”。这些“逃离者”过早见证了“集体主义”的幻灭,收获了无尽的抽离感以及对现实的怀疑意识。在他们心中,东北历史被分解为无数碎片。在历史语境与文化身份的影响之下,双雪涛的小说成了复杂的、分裂的文本迷宫。其小说的世界是各类线束交织在一起的网,而非像一个经过时间成长起来的伟大生命^[5]。

在社会价值观念不断转型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思潮席卷中国文坛,马原、余华、格非等具有强烈创新意识的青年作家,以颠覆性的非线性叙事带给读者震撼性的感受,将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推向高潮。然而,纵横交错、无主次、无边缘的开放性文本空间也使得这些先锋作家无所适从,由于种种原因,其先锋性的探索并未进行到底,他们对人类存在意义的追问似乎只能走向神秘主义。“东北之子”的文化身份牵制以及身份之下历史内蕴的规制,使得双雪涛的小说不再执迷于叙事花样的玩弄,其文本结构充满了集体声音以及集体记忆。因此,双雪涛的小说具有地理学的某些属性: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社会环境以及人物语言,都烙上了东北印记,作品讲

述的是一个又一个关于东北的故事, 其叙事方式具有一定的现实主义因子。比如, 《聋哑时代》如此刻画日常校园生活场景: “她说, 孙老师调查了你家的成分……她说: 你管不着, 她说你家是工人阶级, 扶不上墙。我说: 什么叫扶不上墙。”^{[6]28}在这样的日常微观空间中, 双雪涛将微观叙事与宏观叙事融为一体, 放弃了后现代性的符号游戏与语言悬置, 凭借自身独特的成长经历与主流社会展开深入对话; 在此番交流中, 有关东北的记忆以曲折的方式被勾起, 再现为具有现实因子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光明堂”中具有宗教意味的朝圣, 《大路》《飞行家》《北方化为乌有》《跷跷板》等短篇小说中工人群体的“记忆倒灌”, 还是《平原上的摩西》的红旗广场与毛主席雕像, 甚至连《走出格勒》中的“我”在煤场所发现的尸体, 似乎都承载着历史的重量。其如刘岩所述, “作者仿佛在宣示, 在纯粹的虚构快感的营造中, 浮光掠影的访客经验与深切的历史经验具有同等的材料价值”^[7]。在如此繁复的非线性叙事中, 东北永不消逝, 它赫然浮现于双雪涛小说创作的地表, 如同一块刻满现实记忆的纪念碑, 就像《走出格勒》中通过“我”为“老拉”背诵的曼德尔施塔姆的名篇《列宁格勒》中的句子——“彼得堡, 我还有那些地址, 我可以召回死者的声音。”^{[8]99}

作为东北失落后的“逃离者”的创作, 在双雪涛小说的文本结构中, 宏大的整体意义以及肃穆的现实主义书写仿佛被取消, 其读者恰如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 居无定所, 但集体主义以及历史记忆的召唤, 又使得作为“共和国之子”的双雪涛不得不介入他所逃避的历史。繁复多样的叙事策略的调用, 似乎也见证了他所代表的东北“子一代”在不同文化身份前的徘徊姿态。于是, 在双雪涛的小说中, 特定历史语境中各种社会文化因素流通、交汇、融合、辩论, 不同思想取向交互扭结、对话、搏斗, 形成了“新的美学原则”。

二、文本对话: 对于东北的追问

文化身份的对峙, 使得双雪涛的小说成为具有现实主义因子的多层文本, 具有多类聚焦者的独特视域。童庆炳如此解释文化诗学的任务: “恢复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的同在一个‘文学场’的相互关系, 给予它们一种互动、

互构的研究。”^[9]在文化诗学视角下, 足以看出, 在双雪涛小说文本结构中, 集体话语与个人话语、父辈规范与子辈个人主义正在以别样的方式相互对抗。这种对抗暗含着作家对于东北失落之谜的理性探讨与追问, 作家显然试图通过结构沟通文本自我与社会他者, 恢复文本结构与历史互构、对话关系。

在双雪涛小说中, 故事外层的受述者不断进入故事的内层, 而故事内层的叙事走向又影响着外层的发展。《刺杀小说家》的“我”与小说家的互动, 时时刻刻影响着故事的走向, 小说家所创造的小说文本又再度影响到“我”杀死小说家的计划。《走出格勒》由四类文本组成, 分别为24岁“我”的经历、12岁“我”的经历、父亲的回信以及施塔姆的诗歌文本《列宁格勒》。儿时的艳粉街随处可见妓女、流氓与劫匪, “我”急切地想要逃出这个地理空间。最终, 艳粉街被夷为平地, 盖起无数栋同质化的高楼, “我”也在现代工业化与技术化的进程中逐渐成了“核心市区”的居民, 然而, 12岁时的记忆伴随着《列宁格勒》的传唤一次又一次闪现。在《长眠》中, 老萧因往事与“我”分道扬镳, 文本所分裂出的两类取向——老萧的诗歌与“我”的现实经验进行对抗, “篝火”的意象实现了两类文本的交汇。在《间距》中, 疯马在梦呓中动手, 几乎将“我”掐死。在梦与现实的交汇中, “我”处于历史与梦境的结点, 无法脱身。《跛人》中的两位少男少女认为生活毫无意义, 于是在高考后逃离故乡, 却在绿皮火车上见到了陷入疯癫呓语的跛人。跛人的故事与“我”、刘一朵的故事在同一时空交汇, 年轻人的“逃离”浪潮, 猛然间与父辈那深藏心底、难以愈合的历史创伤发生了激烈碰撞。

在《平原上的摩西》中, 那七个“主人公”都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 各类事件相互补充: 庄德增在2008年所遇到的出租车司机, 在李斐的回忆中成了她的父亲李守廉; 蒋不凡的惨案在孙天博、庄树以及李斐的讲述中一步步清晰, 并渐渐逼近真相; 李斐也看似在与庄树的重逢中得到了拯救。尽管双雪涛本人也许能在各类文化身份立场中保持一定的平衡, 但其文本中的不同文化因子却不可能“势均力敌”。傅东心被人针对, 庄德增出手解救, 但看上去如此好心的丈夫却在他人的视

角中成了杀害妻子父亲同事的凶手；在傅东心的故事中，李守廉似乎也是这样一个“施救者”，但在蒋不凡的叙事以及庄树的推理中却成了杀人犯。李守廉究竟有没有杀人？李斐与庄树的结局究竟如何？七人皆是非全知视角的讲述者。这些讲述的相互作用非但没有使故事明晰，反而使叙事充满矛盾与模糊，使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怀疑李斐、傅东心、李守廉、孙天博是否是那个真正可靠的叙述者。如此，文本似乎不再受到作者统一性的意识掌控，反而成了各类主人公穿越时空、各自为营的综合表演场所。

在其他现实主义小说中，即使作者运用了横跨时空、梦境、文类的多线叙事手法，小说文本的意义也终会水落石出，但在双雪涛的小说中，作者通过文本的相互对抗使得小说的意义瓦解，其叙事最终呈现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结构效果。在《女儿》中，读者随着“我”与“男孩”的邮件往来而穿梭于“当下”与故事中，但故事却在“有人敲了一下木门”中戛然而止。那么，来人究竟是不是女儿？在《长眠》中，作者费劲地在老萧之死中插入一首又一首诗歌，在截然不同的“虚实”两个取向空间中，读者很难寻找到新的话语层与原文本的关联性，统一的故事瓦解为碎片。《剧本》中的“疯马”，为何在剧本与现实之间吐出一串又一串梦呓？《刺杀小说家》中的“我”，最后真的寻找到了小橘子吗？《白鸟》中七个用字母命名的人与“我”的故事，又有怎样的关联？脱离常规的记忆使得小说的样貌模糊。

文本的对抗带来了模糊性与能动性，这些不可靠的叙事在双雪涛的小说中生生不息、流转轮回、古怪无常，其与文本呼之欲出的意义似乎毫无关联。正是这种古怪无常，使得双雪涛小说中整体化的象征意义破碎。张旭东如此分析本雅明笔下的“象征”：“从象征的角度看来，个别与普遍，特殊与一般，短暂无常与永恒不朽都可以在内在经验中结合起来……部分的意义只有在整体的意义中方能确立，此刻的意义只有在它被扬弃，即成为整体的一个环节的时候才能被人把握。历史的具体片断最终成为意义之完满的佐证，一如人物的性格和作品的情节服从于走向结局的情节的安排。”^[10]在这里，两种思想价值的对抗结果已然水落石出，代表整体性的传统创作的真实性观念

被瓦解，人们所拥有的集体记忆如此不可靠，那些本应整体化、统一化的象征被无情地切割，集体记忆变得模糊不清，甚至溃不成形，开放性的碎片彻底淹没了整体性的象征。

文化诗学强调在“语境化”的观照下考察文学因素与非文学因素的相互作用。在双雪涛的文本中，东北失落的原因不再只归结于工人群体的市场化转型或是经济社会结构的调整。作为集体记忆的“共和国长子”，鞍钢、一汽、大庆油田等重工业基地往往被构造成“整体性”的象征；白山黑水成了东北的地域印记，甚至东北人的豪爽粗犷也成了气势及力量的指代。不得不说，东北是最合适的“整体性”象征载体，但如今，双雪涛似乎想通过文本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那些曾彰显整体性的象征已黯然失色，沦为了过时的遗物。在20世纪90年代，“工具理性”得到了极大张扬，人们的劳作只能退化为自我表述的经济活动，就如李守廉只能从工厂下岗一样。随着劳动过程的神圣光辉消逝，那片承载着深厚集体情感的东北地理文化空间，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瓦解危机：“在经济社会，这是一个最缺乏象征主义和群体表征的社会，有效的群体表征的基础正在被瓦解，利益的充分个人化和交换价值使群体表征失去了真实意义。”^[11]

在这个“交换”为王的时代，红旗广场、艳粉街、毛主席雕像、《圣经》与摩西，似乎都难以成为人们集体性的象征力量。人们面对着这样一个祛魅的世界，一个去象征化的世界，集体性的想象已经无法存在，过去、现在、未来、生与死似乎都无法获得被整体感知的可能性。因此，商品交换的代表庄德增们缓缓崛起，共同体维护者李守廉们最终走向失落；与《摩西五经》一同出现的李斐失去了双脚，无法行走；红旗广场的毛主席雕塑被拆毁；那间位于艳粉西街的教堂，因为林牧师的意外丧命而在大雪之中轰然倒塌。“在这里，人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人，而是作为机器生产程序中的一个辅助部件而存在——一种被异化的存在。”^[12]如此，文本的后现代性结构意义被张扬，但其是以牺牲整体性感知为代价的。

三、解救意义：寓言与存在的互证

“历史能够被经常和重新解释，并不意味着那

些被称为历史的东西本身发生了变化, 而是人类智慧实现了自足。这句话所隐含的意义是, 解释历史是为了解释现实与未来。”^[13] 在文化诗学的视域下, 文化诗学成为“文化系统的实证性探讨与文学审美性描述的统一与结合”^[14], 文本内部的审美性能够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 从而追求现代社会的完善与人的发展。在文本迷宫的纠葛、悖反以及互动中, 双雪涛小说的文本结构显现出“感受”的特殊面向, 召唤着价值主体的出现, 并围绕这个主体重建具有意义的生活, 在另一层面树立起解救当下与照亮现实的标杆。

现代社会的消费-竞争机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并且重塑着阶级的结构, 现代社会正处在一种持续地去象征化过程中。当代青年人的境遇与 20 世纪 90 年代青年人面临思想危机的境遇相似, 双雪涛以及其读者所面临着的是感受与象征消失的时代。当新世纪的青年人意识到仅凭自己的努力无法实现阶层的跃迁时, 在“方圆几万公里都找不到一个励志故事”^[15], “人们一般会有两种应对态度。一种是执拗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标准, ‘聪明’地过活。而另一种, 则是放弃这种执念, 过‘笨蛋’的生活。”^[16] 就像大部分新世纪的青春文学所塑造的青年人那般, 他们将静止不变地咀嚼着个体的创痛, 或是平抑自身的欲望, 从而成为外表淡漠、心如死灰的人。青年人穿梭于熙熙攘攘、格外热闹的都市, 却大大弱化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热情。20 世纪 90 年代的东北与当前的青年人的处境, 似乎皆能以“祛魅”来解释。人们似乎不再对未来抱有幻想, 因为任何超然于交换价值之外的意义都无所依附。在当代社会, 那个站在世纪之交的、失去双腿感知的李斐, 似乎是失落的东北与当代的共同缩影。在《间距》中的“我”, 创作剧本的动因只是为了获得一大笔订金; 当项目取消时, “我”随意将已经几乎成型的剧本付之一炬。《猎人》中的多数角色与文艺创作有关, 但这些小说创作人、制片人、编辑都无法摆脱无聊的日常生活, 都面临着孤独、零余的精神处境, 如主人公所言, “我无法改变自己, 他们也无法改变他们, 我不爱动弹, 他们就会咳嗽, 他们有跳蚤, 我就会烦恼, 所以最后还是分散”^[17]。

双雪涛文本的内部结构似乎又能使东北故事呈现出不同于“祛魅”的别样意义, 这或许是其打开当代写作另一界面的奥秘。正是文本的对抗与互动, 赋予了双雪涛作品以无限延伸的未完成性。在这种开放而流动的状态中, 作者巧妙地拆解了语言的固有隐喻, 使得语言不再仅仅作为描述物的工具, 其潜在的主体性得以释放, 迈向了一个充满多解的广阔天地。《平原上的摩西》中“摩西”与“平原”的指代, 《长眠》中老萧的诗歌, 《间距》中的剧本大纲, 或是《猎人》中的台词, 甚至是《圣经》中的文字, 都具有某类唯美化的价值特质, 却又存在着某类意义的缺失。它们像数不清的镜子, 每一个镜子都重叠着读者私人化的个人意识。作者并非控制着读者进行阅读, 相反, 在他这里, 读者自身拥有了选择的权力, 能够构建起自己的世界。

明显的未完成性, 使得读者在双雪涛精心构建的小说世界里, 化身为《巴黎的忧郁》中的波德莱尔, 成为孤独而沉思的散步者。这也使得双雪涛的文本逃脱了整体象征的桎梏, 而接近于本雅明所阐释的那种充满个人感受意味的“寓言”。

“每一个人、每一个物、每一种关系都可能表示任意一个其他的意义”, 因为读者独特的感知力, “所有具有意指作用的道具恰恰因为指向另外之物而获得了一种力量”^[18]。读者的个人感受或许能为当今时代带来无数种碎片式的新意义。双雪涛的小说充满着主体性感知的意义, 使得读者在触碰结点的一刻, 唤醒了关于这个文本世界的“刹那的闪念”。《平原上的摩西》中的“平原”似乎拥有呼唤“曾经”生活世界的的能力。故乡与生命的本质在作者的叙述中显现, 读者的内在“感受”因抒情化的意境被唤起。读者自身的主体感知力在逐渐弥散的语言中, 凸显了超出主人公以及作者的主体意识, 抵达文本中事物的瞬息存在, 就如小说的尾句, “烟盒在水上漂着, 上面那层塑料在阳光底下泛着光芒, 北方午后的微风吹着她, 向着岸边走去”^{[19][24]}。在此, 所谓“平原”的指涉意味, 发展为具有感受性的抒情因素, 年逾 30 岁的李斐与 7 岁的李斐相融合, 并在一瞬间定格。读者似乎也忘却了事件的真相, 因为意义就存在此处, 无关事物的结局。正因如此, 庄树才能把湖水变成平原, 让李斐走来, 让李斐口中那“烧

得高高的”“一片火做的圣诞树”出现。这样,时间暂停在重逢的一刻,甚至能与过去的20年相交融,与世俗化、标准化、均一化的真实经验对立,使读者抵达“弥赛亚式”的停滞时刻。正是这一瞬间,文本获得了某类灵力,语言似乎不再具有形体的厚度,但语言召唤着读者的意识,并与读者的主体性交相辉映。如此,小说的诗性才成为可能,东北这块已经丧失象征意义的土地才能复现其真实面貌。正如伊格尔顿所言:“当下的某个时刻可以回到过去的某个时候,并且将它赎回,让它以一种从未预想到的方式再活一次,将它刻写在必定已将它遗忘了的历史之中。”^[20]

巧妙的是,双雪涛小说的主人公获得赎回的方式,往往都是“感受”。按照本雅明的救赎理论,正是这些个人化的感受以及非意愿性的经验构成了通向灵氛的梁津,其如詹姆逊所说,“灵氛之于事物世界,正如‘神秘’之于人类活动的世界,正如‘超凡’之于人类世界。在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上,它也许在它消逝的那一刻更容易找到”^[21]。在《长眠》中,老萧的诗歌与“我”平庸无奇的生活相对抗,最终,“我”在返程的火车上阅读老萧遗存的诗稿《长眠》,“成为烛芯/成为地基/让我们就此长眠/醒着/长眠”^{[19][41]}。我在凝神静观下似乎见到了读诗的老萧用手掌守护着蜡烛微弱的火苗。在《间距》中,“我”这个二流作家处在梦与现实的交汇处,梦境唤醒了“我”某类拯救现实的希望。虚实之间,文本内外,在“当下”与“过去”交错的灵氛中,我们是李斐,是《长眠》中的“我”,是《间距》中正在做梦的作家,是《跛人》中曾陷入迷失却最终选择承担的少年:主人公、作者、感受者互为一体,无法分开。在此,双雪涛的文本真正脱离了文字的牢笼,其文本的外部与内部在这一刻融为一体。

于是,在这个“如何寻回当代价值”的分岔路口上,在双雪涛的文学殿堂里,他与读者共同在个人的细腻感受、丰富经验与深邃“寓言”文本的交织中,汲取了对抗现实的力量。各类文本、各类修辞以及各类个人的感受,由“寓言”支撑,携带着本雅明式灵氛碎片的指涉。在模糊了现实与虚构界限的当下,我们似乎见到了某种久违于“80后小说”的力量:作家并非迫使主人公与读者大声呼叫,企图寻求失落的整体象征,在孤独

的深渊中,祭奠已然死去的过往;更不似郭敬明、张悦然等人那般,以慈悲的模样,悠然自得地审视这世间万象,以不在历史现场的借口逃离历史幽灵的掌控。他所做的,仅仅是感受,并引导他人感受,在感受的崛起中把握知觉,把握抒情,把握觉悟,把握瞬时,并在拥有无限意义的世界中寻找救赎现实的某一个褶子,从而实现寓言与存在的互证。尽管救赎最终无法成功,但双雪涛用一种很笨拙的方式呈现了某种已经消亡的伟大,如《光明堂》的主人公张默荒诞地在冰天雪地中想要丈量出艳粉街的面积。“我第一次知道艳粉街的面积这么大,影子湖以西,是一条漫长的土路。我便沿着路走,感觉到汗从身体里渗出来,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81][82]}在无穷无尽的感受与抒情中,“我应该再也不会被打败了”^{[6][43]}。

阅读双雪涛的小说,其文本的特殊结构往往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文化诗学视域之下,专注于对双雪涛具体文本结构进行批评阐释,并与历史以及当下的现实语境相结合,我们就能够恢复其文本结构与社会的对话以及互构关系,挖掘出其别样的诗意品格。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叙事向度便是“逼近现实”,而现实又分为内在现实与外在现实两个层面^[22]。双雪涛的写作,恰恰逼近了读者内心的现实。他的文本突破了内外的隔阂,在读者、作者以及小说主人公感受的交融合一中,真正超越了文字的力量,指向了现实。青春写作的母题在双雪涛的创作中运用、演化,最后刻上了属于他自身的烙印,但这种个体性的“感受”能否真正疗愈集体历史所遗留下的创伤,能否真正挽回当下的某种价值?这一点似乎连双雪涛自己也无法确认。由于象征的失落,子一辈与父一辈所承受的所有隐痛都隐喻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压抑与挣扎。在荒芜的历史面前,作家只能如同听“将令”的鲁迅,以曲笔平添一个花环,将活在“祛魅”社会的年轻人暂时拉入一个又一个虚构的梦境之中。但无论如何,即使最终这些个人化“感受”需要再度回到落败的现实,双雪涛所构建出的似真似假、如梦如幻的文本世界,多少能给读者带来某种潜在的希望,获得某种对抗现实的力量。

参考文献:

[1] 卡特琳娜·克拉克, 迈克尔·霍奎斯特 [M]. 语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83.

[2] 鲁太光, 双雪涛, 刘岩. 纪实与虚构: 文学中的“东北” [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9(2): 23-35.

[3] 沈阳市旅游局. 福运沈阳国之长子 [M].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6: 74.

[4] 乔治·拉伦. 意识形态与文化身份: 现代性和第三世界的在场 [M]. 戴从容, 译.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194.

[5] 福柯. 另类空间 [J]. 王喆, 译. 世界哲学, 2006(6): 52-57.

[6] 双雪涛. 聋哑时代 [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7] 刘岩. 世纪之交的东北经验、反自动化书写与一座小说城的崛起: 双雪涛、班宇、郑执沈阳叙事综论 [J]. 文艺争鸣, 2019(11): 22-31.

[8] 双雪涛. 飞行家 [M]. 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6.

[9] 童庆炳. 文化诗学: 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 [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6): 132-135.

[10] 张旭东. 寓言批评: 本雅明“辩证”批评理论的主题与形式 [J]. 文学评论, 1988(4): 149-157.

[11] 耿占春. 失去象征的世界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79.

[12] 李永中, 韦亮节. 贾樟柯电影对城镇化的书写与审思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5(1): 62-67.

[13] 江山. 互助与自足: 法与经济的历史逻辑通论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21.

[14] 蒋述卓. 文化诗学批评: 第三种批评的构想 [J]. 广州文艺, 1997(3): 15-18.

[15] 韩寒. 青春 [M].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27.

[16] 黄平. 定海桥: 王占黑小说与空间政治 [J]. 小说评论, 2020(4): 37-52.

[17] 双雪涛. 猎人 [M]. 北京: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9: 35.

[18] 瓦尔特·本雅明. 德意志悲苦剧的起源 [M]. 李双志, 苏伟, 译.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19.

[19] 双雪涛. 平原上的摩西 [M].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6.

[20] 特里·伊格尔顿. 我们必须永远历史化吗? [J]. 许娇娜, 译. 外国文学研究, 2008, 30(6): 9-14.

[21] 詹姆斯·马克思主义与形式 [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0: 64.

[22] 关琳琳. “灵魂本身的图像”: 论博尔赫斯对残雪文学观的影响 [J].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7(4): 108-114.

责任编辑: 黄声波

(上接第 83 页)

和精神, 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 成为构建中国新时代文艺理论话语体系的根本指南, 指引着当前中国文艺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道路奋勇前进。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 2 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2]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5-01-01(2).

[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 人民日报, 2022-

10-26(1).

[4] 习近平.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10-15(2).

[5]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6-12-01(2).

[6] 习近平.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21-12-15(2).

[7] 逢先知. 毛泽东年谱 (1893—1949): 中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 151.

[8] 陈晋. 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下册.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6: 1564.

[9] 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M]. 周琪, 刘绯, 张立平, 等.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72.

责任编辑: 黄声波